

■ 吕型伟/著

第四卷

吕型伟教育文集

LÜXINGWEI JIAOYU WENJI

——一生与教育有缘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吕型伟著

第四卷

吕型伟教育文集

LI XINGWEI EDUCATION COLLECTION

——一生与教育有解

（内部发行）

■ 吕型伟/著

第四卷

吕型伟教育文集

LÜXINGWEI JIAOYU WENJI

——一生与教育有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与教育有缘 / 吕型伟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8

(吕型伟教育文集)

ISBN 978-7-5444-1348-0

I. 一... II. 吕... III. 教育学—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4255号

吕型伟教育文集 (共四卷)

吕型伟 著

责任编辑 尹亚年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地址: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79.75

插 页 22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1348-0/G · 1096

定 价 120.00 元



吕型伟

目 录

Contents



《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

——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自序 / 1

母亲的烙印 / 5

充满问号的童年世界 /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14

在书海里遨游 / 17

三个青年的朦胧追求 / 20



17岁当校长 / 24

小荷才露尖尖角 / 30

师恩难忘 / 35

社会的磨炼使人成熟 / 46

挑战权威 / 50

单刀赴会 / 53



接管缉黎（市东）中学 / 60

教育探索在市东起步 / 67

“土改”和“四清”逸事 / 72

老师是最幸福的 / 77

语文学科的“文道之争” / 81



多办学校 少办监狱 /85

参加宴请，自己掏钱 /91

在惊涛骇浪里学习游泳 /93

制订中小学工作条例

——我们自己的教育学 /97



参加中苏论战 /101

实践毛泽东春节谈话精神

——在南京师大附中蹲点 /104

文教书记对我的两次考试 /108

“王老五” /112

部长送我一句话：在劫难逃，自己保重 /114

拒绝讲假话 /120



恢复上海中学的故事 /124

改革教育结构 探索职业教育 /126

“状元”校长和“光头”校长 /132

竞技体育与健康体育之争 /137

为什么复办女子中学 /140

赵屯，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范例 /143

办好所有中小学 教育好所有学生 /147

迪斯科的故事 /151

从“开展课外校外活动”到“提出两个渠道并重” /153



关于“三个面向”的故事 /157

为上海争取高考自主权 /161

设计“面向未来的学校” /164



基础分流 弹性管理 多元发展 /170

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 /174

只怕人心变冷

——关于德育的思考 /178

创新与创新环境 /185

人生的起跑线在哪里 /190

王震同志尊师重教的故事 /196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一次对话 /199

第一次出国访问 /201

参观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馆 /206

乌龙茶与原子辐射 /211

馄饨和山芋的故事 /214

从“教育储备金”说到“民办教育” /217



养身之道 /221

充实、愉快的晚年生活 /227

我们究竟在探求什么 /235

《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

——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后记 /244

后记 /248

附录 /253

《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 ——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自序

如果在书店的角落里偶然发现这本书，看了书名，你肯定会产生一个疑问：这是一本什么书？怎么把高贵的人与渺小的蚂蚁放在一起？于是，你也许会随手拿起来翻几页看看。这就起了广告作用。不过，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且是一个老得被称为教育界“活化石”的老教育工作者，市场意识对我们这些老人来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我绝不想故弄玄虚，引人上当。

这不是一本戏说之类的历史小说。乾隆可以戏说，康熙可以戏说，而我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无戏可说，编造出来也无人要看，更何况我始终认为教育是一门科学。

这也不是一本传记。世界上只有大人物才有传记，写传记的人得有资格，我不过是在教育这块园地耕耘、播种的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分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无传可记。虽然，也可以说似乎十分荣幸，上海教育电视台曾拍摄了一部系列片《一代名师》，收集了百年来我国著名的教育工作者共100人，其中，我也有幸忝居末位，也算是传记。

这甚至也不是一本回忆录。回忆录大体得有个年代顺序，哪年哪月，何时何地，都要条理分明，而这本书往往缺头少尾，不成体系，所以只能说是散记或散忆，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几件事情，几点感悟。就这么一本书，记录了一个从教近70年的老人的一些回忆。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与我一起被任命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季羨林老先生写过一本流传甚广的《牛棚杂记》。由此得到启发，我就把这本书定位为散记。散记者，不求系统，不求完整，也不求严谨。记得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智者诸葛亮自称为“散淡的人”，我不敢攀比，此处只借用他的一个“散”字。

书的内容虽然散，但主题明确，即把蚂蚁作为出发点来研究教育。这是我的一点感悟。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人，教育学就是“人”学，而人也是地球上无数生命中的一种，这一点与蚂蚁是一样的。据动物学家研究，蚂蚁一点也不笨。人类在几千年前学会了种田，并认为农业生产是自己的一项伟大发明，是迈向文明社会的跳板。其实，蚂蚁从事农牧业比人类早得多，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一些能分泌蜜汁的昆虫，如瓢虫等，会被蚂蚁养在洞穴中并吸食它们分泌的汁液，活像蚂蚁的乳品厂；一种叫切叶蚁的蚂蚁还会把采来的树叶嚼烂，用以培养一种真菌，作为食品。蚂蚁同人类一样，是一种组织严密的社会化动物。我也确是从喜欢研究蚂蚁开始认识世界，后来又研究另一种社会化动物——人的，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尽心尽力，生命不息，研究不停。人类一贯妄自尊大，认为自己是上帝创造的特殊生命，与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不同。后来，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人类仅仅是猿的一个分支，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但人仍然不肯低下高贵的头，把自己同小动物“混为一谈”。不过，我的这种降低人的身份的想法也许算不上是什么创见，因为我们的先人也曾把天地间的生命体分为五类：人类（叫倮虫）、兽类（叫毛虫）、禽类（叫羽虫）、鱼类（叫鳞虫）、昆虫类（叫疥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说，我们引以为豪的祖先夏禹并非实有其人，而是一条虫（“禹”字里面是个“虫”字），一个传说中的图腾而已。这样看来，我的说法不能算大错。

更何况，我现在还继续对蚂蚁保持着兴趣。到野外或公园游览时，仍然会蹲下身来观察这个机灵的小动物。我的书橱里也有一些动物学家写的专著，如美国埃里奇·霍依特的《蚂蚁帝国》（海南出版社），英国动物学家莫利斯的《裸猿》等。我把它与其他的教育专著放在一起，常常会去翻翻看看，兴趣盎然。

人常常被自己营造的光环所迷惑，因而往往使教育工作走入歧途。当前的独生子女现象，更使天下父母看花了眼，以为他们个个都是天才，长大都能当“总统”，不能冷静对待自己的孩子，赶着鸭子上架。如果还人类，特别是儿童——正在从猴子变成人的过程——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也许会更加客观、更加理智地认识儿童，认识学生，认识自己的孩子，从而使教育工作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有实效，将他们培养成人或是培养成才的概率也会更大，这应该说不是一件坏事吧。

当然，人还是人，不能与蚂蚁等同，这是不应该被误解的。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动物学家，是以教育儿童、研究人的成长规律为目标的，并将为之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人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一个容量很大的大脑，还有一双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大脑的手。就是这两个器官，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拉开了差距。陶行知先生就写过一首诗，歌颂这两件宝贝：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这首诗通俗易懂，发人深思。

现在脑科学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而且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对第二大脑的手，研究不多，人们也习以为常。其实这也是一门很深、很值得注意的学问。我建议大家不妨看看美国科学家约翰·拉塞尔·内皮尔写的《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肯定会有所启示，从而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重视动手能力的培养。

研究已经证明，人脑与手联系十分密切，而且似乎是互相感应的。中国人常说心灵手巧，其实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手动得越多就越巧，手巧才能心灵。

书中有相当篇幅叙述了我从小到大、从家庭到学校的一些经历，这是我以后形成种种教育理念的背景。存在决定意识，历练形成理念，一切思想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包括人生观、价值观。

关于我的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的文集，收集了改革开

放以来我发表过的文章，书名为《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分上下两集，约80万字，可参阅。

我曾经宣称，我讲话、写文章都是讲自己想讲的，写自己想写的内容，并主张“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可是，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要完全做到上述要求是很难的。通观全书，可能新意不多。我期待着对这本书的批评。

母亲的烙印

1966年10月的一天，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把我从北京卷回上海。

事情发生在我回上海一年多以后的1968年8月。墙壁上刷满了标语，台下挤满了早已被煽动起来失去理智的人群。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对着我的，但很快我被揪到台上。

只听年轻的小将断喝一声：“你要交代，你的父亲是什么货色？对待共产党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有点难度，我仔细想了想，一个字一个字，缓缓地说：“我是1918年生的，我父亲是1919年死的，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因此，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对共产党是什么态度。”我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样子，但是台下已笑成一片。

我出生在绍兴新昌一个农村医生的家里。父亲吕晋舆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时逢废除科举制度，他弃文从医。父亲为人善良、厚道，是当地颇有影响的好中医：给有钱人看病时收点诊金；对没钱的病人，非但不收费，而且煎好了药送过去，在当地很有人缘。后来因为为人治病，不小心传染上不治之症，不幸撒手人寰。当时，我还在襁褓中，刚满1岁。

这里赘述一笔，我是1918年5月25日生的，阴历是四月十六。我的身份证上是7月2日，这是错误的。我曾多次打更正报告给派出所，希望得到纠正。或许他们认为这是个不太重要的问题，所以一直没有人理我。我想，假如哪天我成为名人，如果因为我的出生时间而产生两个流派，那不太好。为了日后避免不必要的纷争，我在这里写明我正确的出生日期。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有劳力，母亲就把祖上留下来的五六亩土地租给一些没有土地的农户，收一些微薄的租粮。虽然家里母亲、姐姐、哥哥和我4张嘴全靠这点租粮过日子，但对于农户交来的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母亲都不计较，我们的生活水准同他们也相差无几，所以我家与农户的关系都很好。

我的祖父很长寿，所以我有长寿的遗传基因。我懂事之初，祖父年事已高。记得每到冬天，他就要我睡到他的被窝里，为他暖脚。这可是个好差使，因为祖父睡得晚，要吃夜点心，这时我也可以分享一小碗米粉。祖父喜兰花，每年春天带我上山去找，把兰花挖掘回来，种在家里欣赏。一到花落，一定带我上山，把兰花种回原地，不让它枯死。用现在的理念来说，是保护生态，而祖父的解释是兰花有灵性，恋故土，移栽到别的地方就不开花了。

新昌人“勤耕读、崇孝悌、尚廉耻、砥名迹”的风气世代相传。我们家的墙上就挂有朱子家训，比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从小就是看着家训长大的。

母亲常常说，父亲去世之前反复叮嘱她，家里再穷，也得让孩子念书，如果不念书，宁可绝种。母亲自我懂事起，就将这句话反复念叨给我听，“你要念书，你要争口气，你要有出息”。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小时候，我们村里很流行赌博。闲暇之时，总有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赌博。我们这帮小孩子也跟着学样。那时候我家里穷，没有钱作赌资，就到河边捡贝壳。我收集了很多各种形状的漂亮贝壳，放在罐子里，集了满满的一罐。一次，我捧着罐子，就像捧着我所有的积蓄，兴冲冲地找小伙伴们赌。赌博总有输有赢。这一次，运气真的很不好，从头到底都是输。我恼羞成怒，偏不信邪，孤注一掷，一下子把所有的贝壳都押作赌注，气咻咻地一定要翻本。可没料到，结果依然颗粒无收。顷刻间，我一无所有，彻底“破产”。看到赢家兴高采烈的样子，我觉得心如刀割。

我一回到家看到母亲，就止不住地嚎啕大哭。母亲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只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哭就不要哭了，有志气，以后就不要再赌。我记住了这句话，以后一辈子再也没有赌过。

母亲叫盛生娥，信佛，是个传统、谦和的人，话不多，终日辛勤劳作。她娘家是读书人家，自己也识点字。她时常教导我们，不要占人家便宜，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让别人吃亏。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柔弱的母亲扛起了家里的重担。她内心很坚毅，懂得怎样保护我们，如何规避风险。因为她的智慧、忍让，我们家口碑

不错，邻里相处都很好。她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她身上的宽厚、乐于助人，成为我日后性格中的主要部分，她的坚强，使我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自信、坦然地面对权威，即使遭遇失败，也不轻言放弃。

我的亲哥哥叫吕型诚，中学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校长。后来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文官考试，考中后，当过县教育科的科长、上海江宁区的副区长。后来参加民主促进会，最后在一所中学当历史教师。他可以说完全是自学成才，论学历只有一个初中文凭。

13岁那年，正是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时候，我不幸生了一场大病——疟疾。当时，这种病是没法治的。村里的医生说，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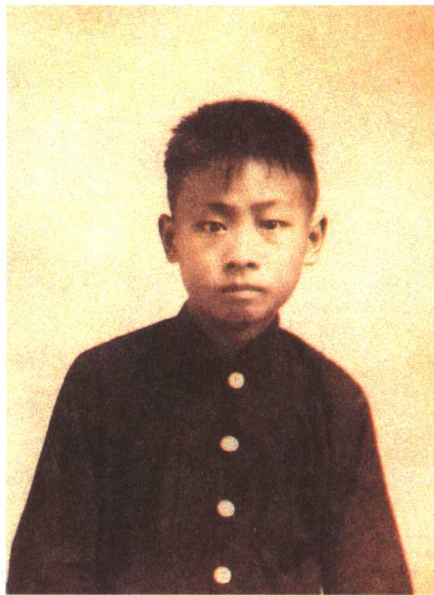
孩子没救了。母亲心疼我，劝我不要参加考试了，留在家里好好养病。我很执拗地说：“父亲说，不读书，不如绝种。你常常要我有志气。我现在生病了，但不说明一定会死。你得让我试试，考上了，让我去读书。”

有时候，一个决定就能改变人的一生。

母亲含着眼泪同意了。在母亲的悉心照顾下，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录取，而且也一直很幸运地活着。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几十年来，无论是在求学时期，还是步入社会，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我之所以能努力进取，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母亲对我的教诲。她的自强、自立、大度，她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的记忆深处。母亲的启蒙教育奠定了我日后成长的轨迹。

母亲很长寿。解放后我接她到上海，目的是便于就近照顾。“文革”中，她被迫返乡。去世那一天，也就是我被隔离审查的那一天，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更谈不上去送终。一直到我被撤消隔离，家里才告诉我。作为儿子，不能为母亲送终，甚至根本不知道母亲去世，心里总是隐隐作痛，有时真感叹自己不孝。“文革”期间，父母的坟墓已被扒平，但棺木未遭破坏。我经当地领导同意，



小学毕业



母亲与她的孙辈

为他们恢复了一个土堆，种了几棵柏树，前面立了一块小石碑，写上了父母与我们全家的名字。我每年都回乡去扫墓一次，以尽孝心。

充满问号的童年世界

我的老家离新昌县城还有两小时的步行路程，那里街巷狭小，阡陌纵横。

我生于斯长于斯，对老家有着浓浓的、挥之不散的感情。近年来，我每年都回老家看看。老屋的青色砖瓦，泛黄的墙壁，褐色的楼梁，大块的青石板地，吱吱呀呀直响的旧木板……构成一幅幅独特的风景画，仿佛一帧帧老的剪影片，上面闪着丝丝的白线，传达着陈旧的气息。

因为我的祖上是大户人家，大门还算气派。进门后，中间是宽敞的堂屋，旁边是两间厢房，地上为青砖铺就。堂屋已被一场大火烧毁，两边厢房很暗，站在背光处望去，仿佛时光隧道，仅有的光亮从这头拉到那头。我家就位于大门边的东厢房。

这间屋子里有我快乐的童年。青砖地面上，年深日久，已被磨出一道道印子，凹槽处是堆积的泥土。蚂蚁就在高低不平的石缝中爬来爬去。他们忙忙碌碌的身影常常抓住了我的视线。经过坚持不懈的观察，我很欣喜地发现，蚂蚁共分三种：满地寻寻觅觅的是一种，有大钳子的是一种，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后来看书才知道，他们分别叫做“工蚁”、“兵蚁”和“蚁后”。地上有一粒米，工蚁就会扛回家去。如果地上的食物比较大，它就用触须和同伴打招呼，同伴就会回到洞里，叫一群蚂蚁出来，而且出来的蚂蚁刚好能把这些食物扛回去。我很奇怪，为什么蚂蚁不多来几个，它们是怎么判断这个食物重量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

后来我又发现，如果这个食物被另一个团伙中的蚂蚁看中了，它也会撒开小